

现代文学论丛

我写这类文章，始终奉行三项基本原则：一是用史料说话，把每条史料的来龙去脉尽可能地交代清楚；二是重在史料呈现，多叙史事，不轻易发议论，最忌妄下断语；三是对史料的考辨或阐释，力求言之成理、信而有征。

掸尘录

现代文坛史料考释

陈建军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 / 陈建军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9
(现代文学论丛)

ISBN 978-7-5378-4400-0

I. ①掸…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文学史研究 IV. ①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2088号

书 名: 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

著 者: 陈建军

责任编辑: 韩玉峰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h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65千字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400-0

定 价: 32.00元

序

陈子善

按照我的读书习惯，对陈建军兄的新著《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也是从此书《跋》开始读起的。《跋》首段，开宗明义，建军兄告诉我们：

到目前为止，我所搜集的新史料，特别是闻一多、朱自清、周作人、郁达夫、朱光潜、废名、沈从文、俞平伯、钱锺书、丰子恺、李健吾、卞之琳、陈西滢、凌叔华、袁昌英、穆时英、方令孺、沈启无等作家的集外佚作，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了。

这是一个十分醒目的作家名单，那么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集外文，竟然都被建军兄发掘出来，实在令我惊喜，也大大增加了我的阅读《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的兴味。

我历来主张，要研究一位值得认真研究的作家，建立较为完备的该作家的文献保障体系，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而编订该作家的著译年表和作品全集正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否则，

连该作家一生到底写了多少作品都不清楚，都未掌握，那研究者的讨论和评判还会全面、客观和公正吗？我所谓的该作家的作品，不仅包括他已发表且已收集的作品，包括他已发表但收集时已删弃或修改的作品，也包括他已发表却未收集的作品，还包括他虽已写出而未交付发表的作品，正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奠基人阿英所早就指出的：

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有虽已发表而不惬意，或因其他关系，在辑集时删弃的，这样的例子是很多，如果我们详加考察的话。可是，无论那作品被删弃的理由何在，对于读者，终究是极宝贵的。富有历史癖或专门的文学研究者，尤其重视，因为，这是增加了他们对于作家研究的材料。^①

当然，作家研究文献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一个过程，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鲁迅全集》的编订，如果从1935年《集外集》的出版算起，到2005年最新一版的《鲁迅全集》问世，正好历经整整七十年时间，还尚且不敢说我们已经把鲁迅的集外文字都搜录殆尽了，鲁迅1929年致郁达夫的三通佚简不是前年才出土吗，何况是其他作家？所以，建军兄在《〈穆时英全集〉补遗》中提醒我们：“‘不全’‘难全’似乎是所有已版中国现代作家全集的宿命。”我对这一观点深以为然。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建军兄这本《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的出版正当其时，功莫大焉。据建军兄回忆，我与他十年前就有书信往还，2009年9月，我们在北京大学“现代作家全

^①阮无名（阿英）：《孤山的梅花》全文，《中国新文坛秘录》，南强书局，1933年6月初版，第149页。

集（文集）整理、编纂学术研讨会”上首次见面。而我对他的印象，最初只知道他是废名研究专家，编纂有《废名年谱》、编订了《废名诗集》等书。建军兄的废名研究侧重于史料发掘和整理一路，本书所收《废名致胡适信写作时间考辨》等五篇关于废名的文字就是明证。其中《〈废名集〉：一个可供讨论的“范例”》尤见功力。王风兄编订的《废名集》确实是近年来现代作家全集编纂工作一个令人特别欣喜的重要成果，或可称之为现代作家全集编纂一个颇具启发的“范例”。而建军兄这篇书评也可圈可点。此文集中讨论《废名集》中数以万计的“注”，充分肯定书中的题注、异文注、勘误注和“重要或偏僻”的内容注的学术价值，并对书中少量漏收、失注和注文欠妥、失校之处也实事求是地一一指陈。如果不是对废名作品的文本和版本烂熟于心，是不可能写出这篇同样足具启发的深度书评的。

但是，直到我们在上海和杭州的《丰子恺全集》编辑工作会议上多次相聚，我才进一步得知他对现代作家集外文的搜集和考订与我有同好。他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查阅海内外各种“图书目录、期刊目录、报纸目录等工具书（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锐意穷搜，锲而不舍，按图索骥，收获累累，不能不令我刮目相看。

《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中所收篇章，除那组废名阐释和二篇鲁迅考订文字外，绝大部分都是发掘现代作家集外文的精心之作。在我看来，其中对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凌叔华、穆时英等作家集外文的发掘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发掘足以纠正以前研究界对这些作家的或贬低或拔高的曲解，足以改写或部分改写对这些作家文学史地位的评价，意义不可谓不大。

由于徐志摩在中国现代诗坛举足轻重的地位，迄今已出版好几种徐志摩全集，重印台港版和新编兼而有之，但徐志摩集外文

的发掘仍有相当的空间。徐志摩1916年求学沪江大学期间刊于该校《天籁》杂志上一系列文字的发现就是近年徐志摩研究的可喜收获，建军兄参与了发掘，并使这项工作最后得以完成。他在1920年8月《政治学报》第1卷第2期上发现的《社会主义之沿革及其影响》等3篇徐志摩集外文，更是系统研究徐志摩前期思想所不可或缺。不少论者一直以为徐志摩浅薄，如果不存偏见，读了《社会主义之沿革及其影响》所揭橥的“今日之学者，当悉心社会科学”的主张，以及文中对社会主义学说史的梳理，恐怕对徐志摩要重新认识了。此外，对于徐志摩致刘海粟的信札，建军兄仔细爬梳1943年《文友》杂志刊本，既发现了通行之徐志摩书信集所遗漏者，又校勘出与通行之徐志摩书信集所收的多处异文，从而得出“徐志摩书信尚需重新整理”的结论，值得徐志摩研究者重视。

陆小曼是徐志摩夫人。也许因为她与徐志摩结合后一度关系紧张，人们一直对她印象不好，评价不高。但陆小曼多才多艺，不但擅长丹青，也写小说、散文、新诗乃至剧本（与徐志摩合作），还译过外国文学。陆小曼虽然作品不多，却是位有自己风格的女作家，后人已编有《陆小曼文存》。建军兄并不以此为满足，在旧报刊中爬梳剔抉，终于发掘出《自述的几句话》《请看小兰芬的三天好戏》《马艳云》《灰色的生活》等多篇陆小曼集外文，澄清了陆小曼“捧角”的真相，还陆小曼喜爱京昆、支持青年女演员自立自强的本来面目，不仅为陆小曼正了名，也大有助于徐志摩研究的拓展，很难得。

有必要强调的是，建军兄对现代作家集外文的发掘，并不仅仅停留在确认集外文之后略作介绍就草草结束这一层面，这其实也是不少集外文发现者常有的疏漏。他善于把发掘工作与对该作家整个创作生涯的考察相结合，或者举一反三，引申至相关的研

究领域，深入探讨。譬如，他不仅在1926年11月16日上海《政治家》半月刊第1卷第13号上发现了闻一多集外诗《往常》，不仅详细分析闻一多为何写下这首思念长女闻立瑛的《往常》，而且更进一步把《往常》与另一首论者已经熟悉的《我要回来》勾连，指出闻一多这首诗并非如论者一直以为的系“爱国诗”或“爱情诗”，而是“完全可以认定《我要回来》也是一首悼念立瑛的诗”。《往常》《我要回来》和另一首《忘掉她》正好组成一组，为我们研读闻一多中期的新诗创作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又如，建军兄分析《闻一多全集》美术卷失收闻一多所作《苏俄评论》（张君勔著）封面画的原因时，笔锋一转，又考证2005年版《鲁迅全集》对《苏俄评论》的两条注释“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曲解了鲁迅的原意”，确是神来之笔。

建军兄说：“搜集现代作家的佚作，不能放过那些刊名中含有‘政治’‘经济’‘军事’‘天文’等字眼的非文学类民国期刊。”这条经验之谈确实道出了发掘作家集外文的一条重要门径。他在《政治学报》上发现徐志摩的《社会主义之沿革及其影响》，在《政治家》上发现闻一多的《往常》，在《全球通讯社福州分社两年纪念特刊》上发现郁达夫的《福州的文化》，在《新动向》上发现朱自清的《论导师制》等等，都证实了这一点。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穆时英与他人合编的《世界展望》。据建军兄查证，创刊于1938年3月的《世界展望》半月刊，虽只出版了短短四期，但穆时英在这份政治性杂志上共发表了两篇《靡语》、两篇《社中偶语》和一篇译文《中国苏维埃的蜕变》。《靡语》和《社中偶语》的主旋律是激情洋溢，抗日救亡，“法西斯日本必然会粉碎在我们的脚下”，“而新中国却正在炮火中诞生成长”。不料一年七个月之后，穆时英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从香港返

回孤岛上海，投身汪伪集团，不久就死于国民党军统枪口之下。建军兄认为穆时英此举“不可思议”，其实，若联系署名“康裔”者1972年10月在香港《掌故》月刊发表的《邻笛山阳——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分析，并非难以理解。穆时英的“转变”事出有因，他当初极力号召抗日是真，后来表面投敌是假，内里负有国民党中统地下抗日工作的秘密使命才是真，而新发现的《世界展望》上诸篇穆时英文字也正好成为他一直坚持抗战的又一个佐证。

发掘作家集外文，还有一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成名作家（包括学者、作家双重身份的饱学之士），往往会在各种场合演讲，演讲记录往往会在报端掲載，报端掲載的演讲记录稿往往未经作家本人审定，未经作家本人审定的演讲稿又往往因口音、方言、表达等种种原因而与作家的本意相去甚远。这类演讲稿，是否可视作集外文，是否可编入该作家的文集或全集，一直存在争议。我的看法是必须慎重，除非能够证实演讲稿已经作家本人审定，否则，不宜匆忙收入文集或全集，最多只能编入“附录”，聊备一格。一些研究者高兴地宣称找到了某作家的集外文，其实只是未经该作家审定或无法证明该作家已经审定的演讲记录稿而已。建军兄在这个问题上与我看法一致，对演讲稿慎之又慎。《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中没有收入作家的演讲稿，绝非偶然。唯一一篇涉及演讲的是《梅光迪与“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文中只如实介绍梅光迪1920年夏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一届暑期学校演讲“文学概论”的三种“文字上多有不同”的记录稿，不轻易作出孰优孰劣的判断，我是完全赞同的。

还必须指出的是，建军兄深知学术乃天下公器，深知建立作家文献保障体系是项需要一代甚至几代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系统工

程。因此，他在自己潜心发掘现代作家集外文的同时，也热情向同行提供线索。去年，经他提供线索，北京赵国忠、眉睫兄在1946年8月25日上海《诚报》上发现了张爱玲的短文《寄读者》。而今，又是他提供线索，我在苏青主编的1946年6月15—18日上海《今报》“女人圈”副刊上发现了张爱玲用“世民”笔名连载的散文《不变的腿》。这次发掘使已知的张爱玲发表过作品的上海小报继《力报》《海报》《小报》《光化日报》《诚报》《小日报》和《海光》之后，新增了《今报》，从而把张爱玲与小报关系的研究又推进了一步。作为张爱玲研究者，我对建军兄深致感谢。

近年来，不少有志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学者对发掘作家集外文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据我有限的见闻，北京解志熙兄出版了《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对沈从文、师陀、于赓虞等作家集外文的发掘和解读卓有建树；河南刘涛兄也出版了《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一书。建军兄这本《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是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新成果。我以为，他不仅仅发掘了那么多重要的作家集外文，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也不容忽视。他为现代文学研究文献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为改写作家个人创作史和重写现代文学史提供了足资参考的新史料。

建军兄很客气，要我为他这部新著写几句话。这正中我下怀，因为我可借此先睹《掸尘录——现代文坛史料考释》为快，并写下自己的阅读感受与建军兄交流切磋。建军兄年富力强，我完全有理由祝愿他在发掘现代作家集外文、考释现代文坛史料的长途上不断有新的收获。

目 录

- 001·废名致胡适信写作时间考辨
- 008·再关于《废名年谱》
- 014·一场没有结果的争鸣
——关于废名的《阿Q正传》研究
- 028·《废名集》：一个可供讨论的“范例”
- 038·别忘了，废名还是位学者
- 042·关于丰子恺的日记
- 052·梁启超佚简一通
- 056·凌叔华早年佚作辑说
- 070·凌叔华佚文及其他
- 096·陆小曼的一次义演和一篇自述
- 104·陆小曼“捧角”
- 113·“《语林》附刊小册甲”及陆小曼佚文
- 118·鲁迅与《Noa Noa》
- 124·《红笑》风波
- 130·梅光迪与“南高第一届暑期学校”
- 135·识《光华文人志》

- 142·穆时英与《世界展望》
- 149·《穆时英全集》补遗
- 176·沈从文《给小莹的信》补释
- 187·新发现闻一多佚诗《往常》
- 191·意外之获：闻一多佚文、佚画
- 195·《读〈新月〉，为〈闻一多全集〉美术卷补遗》
书后
- 201·徐志摩在《天籁》上的三篇佚文
- 211·《政治学报》中的徐志摩佚文
- 245·徐志摩书信尚需重新整理
- 249·关于徐志摩的一则日记
- 267·郁达夫佚文二篇
- 272·俞平伯《辛巳三月题北汀画展》小识
- 276·袁昌英为《峨眉丛刊》作《关于〈莎乐美〉》
- 283·周作人《谈岁时风俗的记载》
- 286·周作人“附记”四则
- 295·朱光潜的几篇集外文
- 311·朱自清佚文小辑附识
- 329·附录 本书文章刊发情况一览
- 332·跋

废名致胡适信写作时间考辨

《胡适来往书信选》收有废名致胡适信两通，其中一通编入上册，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今天瞥见努力月刊出版的预告，真不知是怎样的欢喜；先生的健康不消说复元了，沉寂得要死的出版界，又将听见一声霹雳。

赶忙从故纸堆中誊写了这一篇小说，表示我暗地里也在鼓劲罢。

学生 冯文炳 七日^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编选者注曰：“此信约写于1924年下半年，月份无可考。”不错，此信是1924年写的，但不是在“下半年”，月份亦可考。

^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290页。

1922年5月，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创刊，1923年10月出至75期终刊，废名的早期作品大都发表在此刊上。《努力周报》停刊后，胡适拟办《努力月刊》，并于1924年1月6日在《读书杂志》（系《努力周报》增刊）上登出刊预告，后因故未能兑现。显然，废名是见过《努力月刊》出版预告后立即给胡适写信的，时间当是1924年1月7日。此前，废名共作小说13篇，有9篇已发表，余下4篇未刊者分别为《我的邻舍》《初恋》^①《阿妹》《火神庙的和尚》^②，废名从故纸堆中誊写并寄给胡适的小说很可能就是这其中的一篇。至于具体是哪一篇，则因资料阙如而不可知，只好俟诸高明了。

另一通编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信中进言胡适不该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废名说：

又有好些日子未来听清谈，窃尝以为晤谈而能与人以乐，是特为老博士座上之风也。近日外面流传北大文学院将要多事，而先生又听说已到文学院视事，于是私心欲进一言。^③

此信未具年月，只有“十四日夜”。孙玉蓉先生认为：“根据废名信中的内容分析，此信应该写于‘1930年12月14日’。因为1930年11月28日，胡适为接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一职，从上海搬家到北平居住。此时废名正在北大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任教，讲授散文习作和现代文艺等课程。因此，在1930

①后载《现代评论》周刊1925年4月3日第1卷第17期。

②后载《语丝》周刊1925年3月16日第18期。

③《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版，第43—45页。

年12月间，他不仅有与胡适晤谈的机会，而且也有听到外面流传的有关北大文学院的一些议论的可能。出于对胡适的敬重和爱护，他才于1930年12月14日夜，给胡适写了这封进言之信。”^①《胡适来往书信选》的编选者所作“此信约写于1931年2月”的注释，我认为是欠准确的，但对于孙先生“1930年12月14日夜”的说法，我也实在不敢苟同。

1930年11月28日，胡适离开上海，只是想重回北大任教（所谓归队），并非为了“接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一职”。同年12月，已辞去教育部长职务的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1931年1月底，蒋梦麟“决定用院长制”^②，但在聘请谁来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问题上，则考虑了很长时间。他开始希望陈大齐（百年）干，陈不愿意。胡适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但胡适也高低不肯到文学院任职。是年2月8日，蒋梦麟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过，在文学院院长“未觅得妥人以前”仍由他“暂行兼代”^③。9月14日，北大新学期开学，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梦麟与梅荪（周炳琳）皆要我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今天苦劝我，我不曾答应。”^④1932年2月15日，胡适勉强接受文学院院长一职，开始到任主持工作^⑤，但不久后辞职。1934年2月21日、22日，蒋梦麟两度上门劝胡适回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坚决“不肯”，并说“我若不决心走开，此职终不能得人来做”^⑥。直到1934年5月2日，胡适才“第

①孙玉蓉：《读〈废名年谱〉札记》，《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8期。

②《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51页。

③《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54页。

④《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52页。

⑤《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76页。

⑥《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32页。

一天到北大文学院复任院长”（余英时先生说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属“自告奋勇”、毛遂自荐^①，恐不确），并告诉来访学生代表：“如果我认为必要，我愿意兼做国文系主任。”^②由此可见，1930年12月间，废名是无理由给胡适写什么进言之信的。那么，废名致胡适的这封信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废名信中的另一段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这一谜团：

未开言又得分辨一句，若林损之徒应该开除，无须要别的证据，只看他胡乱写的信便不像是读书人，何能教书，故今之所言不指此。外面说北大又要开除某人某人，如真有此酝酿，在普通人为之，是一件小事，若先生也稍稍与其职责，直可谓之大事。割鸡用牛刀，惹人注意也。

林损（1890—1940），字公铎，浙江瑞安人，原为北大文学院教授。此公生性孤高自负，固执怪癖，后因耽酒、好骂、不用功，由蒋梦麟出面辞退。林损便在北大张贴致蒋梦麟、胡适和学生的公开信，骂蒋梦麟“以无耻之心，而行机变之巧”；骂胡适“尊拳毒手，其寓之于文字者微矣”^③，在《世界日报》发表的公开信中还说胡适“遗我一矢”^④；在《留别学生诗》中称自己“终让魔欺佛”，骂蒋、胡二人“非兽复非禽”，连禽兽都不如。林损的行为

①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30—31页。

②《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77页。

③张宪文整理《林公铎藏扎二十九通》，《文献》1992年第3期。

④周作人：《北大感归录（三）》，《知堂回想录》，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487页。

既大失风度，也引起了公愤。故废名说他胡乱写信，“不像读书人”。与林损同时被北大解聘的还有原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和许之衡二人。林损之事，发生在1934年4月间，同年4月19日，陈钟凡由南京去信林损，即可证之。陈于信中云：“北平一晤，至感近怀。别后于十六日抵京，阅沪报，知台从决辞北大教席，未识下季将设砚何许？”^①但不能据此认定废名致胡适信就是4月份写的。废名在外面听说北大“又要开除某人某人”，并非指林、马、许诸人，而是指后来被解聘的梁宗岱、杨震文、陈同燮等人。这些人的名单，是1934年5月30日商定的^②。此前，废名当然“听说”过胡适“已到文学院视事”，并对“又要开除某人某人”之小道消息有所耳闻。由此可以推断，废名致胡适信应该写于1934年4月至5月间。

废名在信中大谈其对《论语》的新解，并说“拙作《读〈论语〉》，曾蒙赞许，心窃喜之，尚思续有所作”。《读〈论语〉》一文是1934年4月20日发表在《人间世》第2期上的。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废名给胡适写信的时间是在1934年，而且是在4月20日以后。因此，我认为废名致胡适信不是写于“1930年12月14日”，也不是写于“1931年2月14日”，而是写于“1934年5月14日”。

《胡适来往书信选》所收废名致胡适进言信与原件文字略有出入，兹据原信影印件抄录于下^③：

适之先生：

又有好些日子未来听清谈，窃尝以为晤谈而能与人

①张宪文整理《林公铎藏札二十九通》，《文献》1992年第3期。

②《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388页。

③《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6卷），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第586—589页。